

漢唐歷史文化論稿

赵文润◎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漢唐歷史文化論稿

◎ 赵文润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SK19N14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历史文化论稿 / 赵文润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9.11

ISBN 978-7-5695-1126-0

I. ①汉… II. ①赵… III. ①文化史—中国—汉代—文集 ②文化史—中国—唐代—文集 IV. ①K234.03-53
②K24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4563号

汉唐历史文化论稿

HANTANG LISHIWENHUA LUNGAO

赵文润 著

出版统筹 / 刘东风

责任编辑 / 王 森

责任校对 / 王 森 胡 杨

书名题字 / 介永强

封面设计 / 袁樱子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 29.75

插 页 / 2

字 数 / 520千

版 次 / 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5-1126-0

定 价 / 9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科建设经费

资助出版

求学读史生涯 圆梦陕西师大（代序）

——赵文润先生八十岁自述

一、生在临海，长在河边

1936年阴历正月初一（阳历1月24日），我出生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辛寨子镇。生我前，父母育有我大姐赵桂英、大哥赵文明、二姐赵玉珍、三姐赵桂荣。因我是老小，故小名“小小子”。父母也最心疼我，但因为忙于给别人缝制衣裤，所以没有时间疼爱我。当时我家租赁于姓家三间瓦房。于姓房东有一子一女，儿子夫妻在外地教中学，小孙子名“宝宝”，我俩幼年时代成为好朋友。我7岁时常去大姐家玩，他们全家都是吹鼓手。二姐赵玉珍家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二姐夫王成山在大连机床厂当工人，他家离大连海边很近，坐电车两站路就到了。我常去他家里玩，因此7岁时就学会了游泳。

1943年，我7周岁，当时正是日本强占东北，并扶植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史称“伪满洲国”时期。我家虽属满族正黄旗人，但并没有主人公的感觉。我7岁时到大辛寨子镇小学上学。小学校建在镇西边一个山坡上。我在这所小学读了两年书，有两点印象特别深，永远铭刻在脑海里：其一，把日语叫国语，把汉语叫满语。其二，每天早晨8点，教师一声令下，全体学生都到操场集合，喊一声“立正”，大家都面向东方鞠躬敬礼，向日本天皇朝拜。幸好，这样耻辱的岁月，只有两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被世界人民打败了，日本鬼子撤出了中国东北地区。接着，苏联红军进占大连市。在这一年时期内，工厂倒闭了，商店关门了，到处一片混乱。我家开的小裁缝铺也垮台了，没有了收入。我们过了半年忍饥挨饿的艰苦生活。

1946年春季，父亲带着我和三姐离开大辛寨子镇，先向东后向北，从周水

子奔向瓦房店镇。临行前，父母亲同哥哥商量，让哥哥保护母亲暂时留守原住处，实际上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台缝纫机。当时，从大连市到瓦房店镇，一路上火车停开，汽车无影，只见一伙伙行人，三五成群地步行。据说，当时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交火，不停地打仗，当地百姓叫“拉锯战”。白天，逃难的百姓每经一个站口，都要受到国民党军人的检查；夜晚是快走的好机会，但每当见到天上亮起探照灯，便要立即趴在地上。这时三姐紧紧握住我的手，害怕我走丢了。有一次夜晚走到一片森林里，内中有一家人，一对老夫妻与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在一起过日子，夜晚，老两口留我们三人在他们家里过夜，说：“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再赶路”。我一听，就蜷缩在炕头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可第二天听爸爸和三姐说他俩一夜没睡着，担心这家有坏人。过了一会儿，房主人老大娘又端来一碗玉米粥让我喝，我不客气，一会儿就喝完了。老大娘又先后端了两碗玉米粥递给爸爸和三姐。两人喝完后，爸爸说：“趁天刚蒙蒙亮，赶快上路，晚上有人拦路搜索。”我问爸爸：“向哪走？”爸爸说：“往北不远就是瓦房店，到了瓦房店再往西走80里（华里）就到你二姑家了。”于是爸爸还是背上铺盖卷，右手提个小包（馒头只剩几块了），三姐拉着我的手，跟着爸爸，出了好人（忘记了姓啥）家门，还回头齐声喊“谢谢”，我还回头高喊了声“谢谢爷爷奶奶！”爸爸高兴地说：“这才像个好孩子。”

进了瓦房店的街道上，只见人山人海一片混乱。三人没敢多停，拔腿就往西奔。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翻山越岭，走了半天，快天黑了，才赶到辛家寨东头。爸爸一眼就认准了他二姐家。刚进大门，一位老大娘便跑出来接我们，爸爸忙说：“小小子，这是你二姑，快叫姑。”我忙喊：“二姑，你好！”这时，二姑父南福龙也忙出房门，让我们进屋坐。就这样，我们在二姑家住了有两个来月。1946年夏季，父亲去大连市大辛寨子镇，接母亲来复县住。父亲走后，我们姐弟俩感到十分孤单。我表哥、表嫂对我俩十分冷淡，其三个女儿用斜眼看我们，知道我们是穷光蛋。三姐叫她们“白眼狼”。不到半个月，她的脖子都气肿了。二姑毕竟是我们的亲姑姑，爸爸是她的亲弟弟，对我很疼爱，知道我没有吃饱饭，用纸包一块馒头，趁其他人不在，放到我手掌上，我明白姑姑的意思，立刻塞到裤兜里。二姑父坐在炕沿边，装着没看见。二姑夫的小孙子小宝宝，是全家的宝贝蛋，但出乎我的意料，一点不傲慢，还很有礼貌，管我叫叔叔，我俩很合得来。他在地里拔草，我也跟着拔草；他在自家果园里摘熟苹果，我也跟着摘。不久，父亲从大连回来了，见面后我第一句话便问：

“我妈妈咋没来？”爸爸回答：“在你二姨家啦。”于是，几天后爸爸就带着三姐和我来到了杨家屯的二姨家。二姨家原住在大连市金州，二姨父当工人，后来，全家迁到杨家屯当了农民。见到我们全家四口人都来了很高兴，又很着急。他家大小七口人，除了老两口，儿子、儿媳妇，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根本住不下外来人。怎么办？姨父说：“给你们一家四口租套房住。”爸爸立即回答：“不行，我们没钱租房。”他想了一会儿，说：“回前夹河心老家，那里是我们赵家祖先居住过的地方，说不定还可能由穷变富！”

多少年后，我看到了从清朝康熙时期（1662—1722）流传至今的《家谱》和《同宗续谱》，才能讲清我赵氏家族的来源。赵氏《家谱》现存三部，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保存至今，经政府有关部门检查认可是真实的。故复县（即今瓦房店市）三台子乡已更名为三台子满族自治乡。因本乡是满族祖居之地，而且多为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后代。我的堂兄赵文环主编的伊尔根觉罗·达力布《同宗续谱》记载：伊尔根觉罗·达力布，觉罗译成汉语为姓氏，达力布为名，是清初正黄旗人，职务为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住北京草帽胡同。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绘图工程师张慎亮先生曾考察绘图，其中草帽胡同，就在今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西边不远的地方。伊尔根觉罗·达力布当了御前侍卫。几年以后，被调到河北保定任地方官随后又被调回老家复州城任职（住址今作为文物遗址保留）。时值康熙皇帝大搞“圈地”运动，伊尔根觉罗·达力布便为自己的七个儿子在城南20里的夹河心村圈占了约1000亩的土地。“夹河心村”名称由来，因为该村在复县著名的两条河流中间。一条大河是复州河，是复县最大的河流，最宽处有3华里宽，从东向西，再往东南；另一条叫岚崮河，从东北向南，再往西南，在三台子乡西部西兰旗村，与复州河汇合，一起流向渤海湾。夹河心村又分成前、后两个村，前夹河心村、后夹河心村，土改后曾分别更名为太平村、桂林村。

据《家谱》记载，伊尔根家族定居夹河心村后，七个儿子分成七家。主要定居在前夹河心村。达力布病逝后，其子孙在村北马鞍子山（简称鞍子山）南下坡处将其安葬，并在南夹河心村官道（后称东官道）旁，竖立起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刻有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身世及政绩。再往后，其诸子后代穷富逐渐分化。父亲赵克恕是达力布的八代孙。到我辈时，我家田产只有两亩山坡地，中间还有祖坟，生活无法维持。因为家穷，母亲擅长裁缝手艺，所以大约在民国十六年（1927），搬迁到大连市大辛寨子镇。因为大连市房租贵，旅顺

是军港，平民不让进；而大辛寨子镇是大连市通往旅顺港的中间站，居民比较多，开个裁缝铺能有活做。

爸爸带着我们娘仨边走边说，讲解所谓夹河心以及伊尔根家族的来历，不觉来到岚固河边。我一见到激流的河水，心情特别高兴，立即忘记了饥饿、疲倦，恨不得马上跳下河里游泳。但这时河水既浅又凉，不适合游泳。正在这时，站在河对岸的一群人喊叫：“二叔，我来帮你拿东西！”其实，当时我们四人，两手空空，任何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是空手归故乡！我们过了河，族亲们都围上来。第一个和爸爸握手的是赵文刚，和爸爸握手后又和妈妈握手，说到他家吃顿饭。我想，他咋不接我家人到他家住。接着，赵文昭、赵文繁弟兄俩都说：“暂时没有地方住，就到我们家住吧，我们家五间瓦房，文刚大哥家七人才住三间草房。”于是我们四人到文刚家吃完饭，就来到赵文繁家。

赵文繁、文昭是亲兄弟，哥俩都已结婚多年，都30多岁，不知为啥都没小孩，也因此我们两位堂哥堂嫂，对我都十分亲切、热情。特别是两位堂嫂，都对我喜欢得不得了，成天喊叫：“小小子，过来让嫂子亲一下。”我来这家后，还特别喜欢看两只公鸡斗架。为此，大嫂还专门为我买了一只大公鸡，另外一只老公鸡斗不过这只大公鸡，吓得直跑，鸡冠子被咬出血。我感到很好玩，乐得哈哈大笑。两位堂兄，喜欢种玉米、收庄稼、赶马车，教我学会了扶“拉耙子”，给耕地的堂兄当助手，学会干农活了。母亲重操旧业，首先给文繁、文昭兄弟及侄媳妇缝衣服，没有缝纫机，就手握针线缝。有时还给附近产妇手工接生，两个月接生了两个孩子，没发生一点差错。爸爸也重操旧业当农民，干农活。这年秋冬之际，我正和隔壁一个堂弟赵文和玩游戏，突然听见站在菜园子里的一位老太太喊我：“小小子，你回屋里告诉你爸妈，让他们明天到我住的这个大院里来。我家的对面有三间草房，不漏水，只是脏乱些，我们放些破烂东西。叫你爸妈来收拾一下，搬进来住。”我听了老奶奶的话，非常高兴，这回总算有个家，有房子住了！我赶紧跑回赵文繁大哥家，正好爸妈都在屋里坐着，正在谈论找房子住的事情。我立即把老奶奶的意思传达给爸妈，爸妈高兴得几乎喊出声来。还是同一个家族好啊！到这时我才知道：住在前夹河心村的赵姓几乎全是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后代，赵姓凡是文字辈的，就如我与文繁、文昭、文刚等都是始祖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九代孙。三间茅草房打扫干净后，左边两间做卧室，与其他农民的房间一样，土炕土墙，右边一间做厨房。

在1947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四口人住进这三间不要一分钱房租的宽敞房子。这家主人姓赵，已病逝多年；其儿子克字辈，也病逝了，他的老婆，我叫七婶；七婶有个儿子叫赵文忠，大我8岁，我认识他不到一年，他便参加解放军去了；他的妻子，我叫大嫂，生下一个女孩。所以这家人有个特点：留在家中的四代人全是女的。因此，我母亲和这家人的关系特别好，经常为这四代人缝衣服。我见到老奶奶在菜园子里拔草，也会跟着拔。我家最困难的是缺粮吃，有房住了，又不要房租，但没粮吃不行啊。于是妈妈带着三姐和我，到各亲戚家借粮，别说一斗，一升也不借；我暗自想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为父母争口气。还是一个祖宗留下的后代好，赵文繁、文昭听说我家没粮吃，每人扛着一袋玉米白送到我家，把我母亲感动得直流泪。这两袋玉米，使我们一家四口人总算闯过了年关！

1947年春季，我当上了牧羊人。我家邻居是赵文封、赵文田弟兄俩。虽然是两家人，但毕竟是亲兄弟，兄弟合伙养了50多头羊，以补家庭生活开销。为此，有一次二堂兄文封见到我，喊：“小小子，你过来，我与你商量个事，你已经12岁（虚岁）了，能给我家放羊吗？”我一听很高兴就答应了。放了一年羊只挨过两位堂兄的两次训斥。一次在北山坡放羊，我手拿鞭子不停地赶羊，吓得羊到处乱跑。二堂兄文封见到，训斥我：“你这样放，羊还能吃草吗？还能吃饱吗？”放羊要把羊群赶到常年青草茂盛的地方。于是我学会了这一招。第二次在东山坡放羊，我坐在东山坡的一块大石头上不动，一些羊跑到庄稼地里去了。大堂哥文田看见了，喊：“小小子！你这是放羊吗？”他跑到我跟前一看，见我在看书，他把书拿到手，说：“你还看《三国演义》？快看羊去，放羊也不能让羊吃庄稼！”经过两位堂兄的教训，我才学会了放羊。我在东山坡放羊的时候，迷恋上水流涌动、清澈见底的岚固河。河上有一个深水区，深水区是河水向下游整日冲击一处大岩石下而自然形成的，当地人称为“东潭”，有的地方人叫它“东潭”。它的旁边有一片沙滩，每逢夏季，这里是附近村庄青少年男子游泳的好地方。我只畅游了一个夏季，便爱上了这块地方。我经常让小伙伴帮我放一会儿羊，我下去游一会儿便上来继续放羊。虽然到1948年春季我不放羊了，但一直到1956年秋季我去北京入人民大学学习前，每年夏季都要到此处游泳。所以我说我是“生在临海，长在河边”。

二、求学读史的坎坷生涯

从大连市回到故乡夹河心村，我一直渴望上学。1947年，我已经12岁了，怎么还不上学，求学的念头超过我游泳的兴趣。可是，那时东北战争频繁，当地老百姓叫“拉锯战”，导致东北地区大、中、小学一律停学，直到辽沈战役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并将其驱逐出东北，东北地区才逐渐安静下来。

1948年春季，广大的贫苦农民迎来了土改运动。我的伯父赵克忠从小因一条腿瘸，长大后长期给人家打长工，听说穷人要翻身分土地，急忙回到弟弟家，与我们居住在一起。这样我家五口人（父、母、伯父、三姐和我）分了12亩地，4间瓦房，定为贫农。接着，我又盼来了桂林小学的开学。经过考试，我上了三年级。当年秋季，我经过考试，又上了四年级。1949年春季，我经过考试，又上了五年级。当年秋季，我经过考试，又上了六年级，三年读完三、四、五、六年级，念完小学，这在当时叫“隔级跳”。桂林小学有约10名小学伙伴，通过这种方式念完了小学。

当时处在东北解放初期，复县只有三所中学。瓦房店镇（今瓦房店市）第一中学，简称复县一中；瓦房店镇完全中学，因为这所中学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简称瓦房店高中，或者称复县完全中学；复县第二中学，因设在复州城内，故名复州城中学。我小学毕业后，面临考中学。这年的夏季，我到村东岚固河中游泳只有两次，其余时间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当年秋季考上了复州城中学，我上了初中。

复州城距离夹河心村有20华里，中间隔着一条复州大河，涨大水时，最宽河面有3华里，迄今仍未修桥梁。平时河水深有1米，发大水时深处有2米。所以我村几乎没有报考复州城中学的，因为我会游泳，不怕溺水；复州城是一座完整的古城，是金朝时（1115—1234）女真族人修建的。女真族是满洲（简称满族）的前身，所以我对复州城很感兴趣。每逢星期天常到复州城墙上跑着玩，锻炼身体。站在城墙上向东南瞻望，还有一座斜塔，辽时（916—1125）契丹族人修建的，从此更引起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

在初中读书时，对我最关爱的是丁力人老师。他是我们年级最受欢迎的历史课教师，讲课时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学生特别喜欢听。他是我走上求学读史道路的第一个恩师。当时，我也曾有过动摇，他给我指引了方向。有一次学校动员打苍蝇、挖苍蝇，预防和抵抗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我很激动，写了一篇散文《当我蹲下挖蛹的时候》，交给了语文老师。出乎我的意料，这篇

文章第二天便上了全校的广播。许多同学吃惊地喊着：“赵文润的文章上了广播！”我听了特别激动，激动之余，爱好一下子又从史学转到文学，梦想将来当名作家，随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丁力人老师。丁老师说你性格直爽，心里咋想的就咋说，这很好，但你还年轻，今年才十二三岁，要想有个固定理想还得几年。你的记忆力很强，但想象力较差，当作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我认为你要在学历史、研究历史上多下功夫。但不要太偏重历史，现在才上初中，以后要考上高中，因此要各门功课都学好才行。丁老师这番话对我的教育太重要了，因此经久不忘。从此我侧重历史，但也下功夫学好各门功课。因此我才能在1953年秋季顺利考上瓦房店高中。

瓦房店市在辽宁南部，是座知名的城市。当时是复县县政府的所在地，盛产红玉、国光苹果，以及滚珠轴承和纺织品。瓦房店高中是全县唯一的高中。地处镇东大岭下，每届招收四个班，大约200人。学校周围被苹果树所包围，空气特别新鲜，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因为我的理想是考大学，一定要考上名校，因此三年高中有两个寒假没有回家，在学校复习功课。而每个暑假我都要回家，因为家乡有条岚岗河，岚岗河里有深水区，能让我游个痛快。在高中三年学习期间，有三位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他们的课讲得好：一位是历史教师郝南湖，一位是语文教师赵耀，另一位是政治教师毕丹。这三位老师和丁力人老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求学读史的引路人。

1955年秋季，我确定了高中毕业后要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方向，因此学习更加努力和勤奋，成绩不断上升，名列班上前几名。但此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却令人担忧，主要原因与其他广大贫困农民一样，土改后不久实行互助组织、合作社等经济方式，个人所有的土地越来越少，甚至没有。此时伯父已病逝，三姐出嫁，姐夫杨连仲先为农民，后当工人。1956年时我父亲57岁，母亲56岁，在那种以劳力定工分的年代，年终所得工分、所分粮食仅能维持两位老人的温饱，哪有余钱供我上大学，特别是上名牌大学。正在我对报考北大犹豫之际，同年3月的一天，校长于凯润突然召集高三年级四个班全体学生开会，大声宣布说：今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毛主席、国务院教育部的批准，今年3月在全国一共设置二十几个考点进行高考，这叫“特招”，考上免除一切费用上大学，上学四年还有生活补贴。考不上，等于一次高考练习，继续上高三，过几个月参加全国统招。这有多好啊！他的话音刚落，高三将近180名学生一起热烈鼓掌，有些学生（包括我）都高兴得跳起来！

会议一散，我便全力以赴投入学习准备高考，认真复习各门功课。3月初，我便根据人大特招考试日期，提前一天到二姐赵玉珍家住下，先找到我参加考试的考场。实地一考察才知道，该考场在大连市西岗区一所中学内，距离二姐家坐电车只有两站路。于是我跑回来告诉二姐、二姐夫，他俩都很高兴。当时他全家只有四口人，二姐夫王成山，原是距大辛寨子镇南不远的花红沟村农民，后当上了大连市机床厂工人。我去他家时，他们的大女儿王淑梅才10岁，大儿子王文群才3岁，当晚我睡在他旁边。我在他家四天，吃喝睡都在他家，让我十分高兴。这次高考能取得优异成绩，我得感谢二姐、二姐夫的热情接待。

在大连市高考结束一个月以后，成绩即下。可能瓦房店高中取得成绩欠佳，没有由校长公开宣布，而是由考中者所在的班主任把录取通知单交给本人。瓦房店高中生在大连市考点参加考试者总共173人，录取者包括我一共才4人。所以校方也就不好意思张扬。但是，复州城中学领导却很满意，因为四个考上人民大学的，有三个是该校初中毕业的，我和张忠卿、毕玉琦。

这年6月份，我们三个人与其他高三同学一起参加毕业考试。7月初颁发了毕业证书，正面题写的是毕业证书，签名是辽宁省复县中学校长于凯润、副校长谢国文，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背面是考试成绩，当时仿照苏联用的是五分制。语文、历史、宪法、代数、几何、体育、物理、制图、外国语，九科全是5分，只有三角、化学两科是4分，可见我的理科成绩略逊于文科。因此我考大学的方向瞅准历史学是正确的。

1956年夏季，年过20岁的我，畅游岚嵒河。8月，我告别故乡，奔向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在北京东四12条海运仓，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是北京医学院。另一部分在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入校后分班才知道，我被分在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张忠卿被分在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都住在东四十二条；毕玉琦考入历史档案系，住在“铁一号”。我的目的本来是大学毕业后教研中国古代史，怎么会走上读研中国革命史的道路，这不是求学读史生涯的又一坎坷吗？好，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学！

入人大历史系的第一堂课，是由孙家骧老师讲授的《中国古代史》，他讲课生动、幽默，学生爱听。比如他讲“男”字的来历，他说：“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能在田里耕地出力气的人嘛！”引起学生们哈哈大笑。讲隋唐史课的沙知老师，当时很年轻，只比我大十来岁，讲课声音清脆、流畅，他对武则天评价比较高，肯定武则天是杰出的女皇帝。我中年以后研究武则天，史

学界有人开玩笑，说我“抱着武则天的大腿不放”。我研究武则天，是从沙知老师给我们讲隋唐史而产生的念头。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戴逸、彭明、袁定中等老师讲授的，尤其是戴先生，讲课时间长、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同学们都反映讲得好。

但是好景不长，1956年5月第二学期尚未结束，反右派的前兆开始出现。从上到下，发动群众（包括广大学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不久大字报贴满校园，接着，便是反右派的政治运动展开。当时，反右派运动最激烈的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另一个便是中国人民大学。同年6月，反右派便在各地召开大会，由于在反右斗争中我为我们班里被确定为右派分子的三人辩护受到牵连并受到共青团团内警告处分，从此我才背上了政治包袱。

1957年“反右”风暴刚过去不久，又掀起“拔白旗，插红旗”的“红专大辩论”运动。1958年夏季，课余时间，我在图书馆看《资治通鉴》。与《史记》比较，《史记》是中国历史上首部纪传体史书，《资治通鉴》则是第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二者都是杰出的传世之作，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必读的历史文献。人民大学老师在讲中国古代史时经常引用这两部书。既然这两部书如此重要，我上高中时读过《史记》全书，如今入人民大学，一定要把1956年中华书局刚出版的《资治通鉴》通读一遍。没想到因此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有一天，我在图书馆正全神贯注地翻阅《资治通鉴》。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学生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书，旁边还要放上一本《红旗》杂志，见有人来，就假装看《红旗》杂志。有一次我看《资治通鉴》入迷了，听见门响，还来不及掩盖，团支委刘某看到我正在看《资治通鉴》，他立即向党支部汇报。过了没几天，就把我确定为全历史系“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次挨批判了，我并没有产生悲观情绪。我从小学就有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愿望，而且老师们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这门课，特别是有两位老师在找我个别谈话时，说的一个意思：“文润，看《资治通鉴》，是学中国古代史应读的书，只要下功夫读，就能有大的收获，不存在什么白专。”两位老师分别对我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坚持在课余把《资治通鉴》读完了，这对我后来的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批“白专”的大风大浪刚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掀起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人民大学也不例外。由于我为彭德怀元帅辩护，又遭到了批判。那么，在人民大学四年中，我有无一些亮点留在记忆中呢？有！

其一，从迈入人民大学校门开始，我连续几年从9月中旬开始，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到天安门广场练习走步，10月1日国庆节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前挺胸阔步地游行，目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领袖人物。

其二，全校师生最尊敬的校领导是吴玉章校长，他高大的身材，白鬓苍苍，讲话声音洪亮。我入校后第一次听他讲话，是在铁一号报告厅。他走上讲台后，大家一看齐喊这不是《开国大典》名照里，站在毛主席身边那位老人吗？正是，正是，大家呐喊，接着掌声雷动。他讲话声音清晰，吐字准确，基本上是照稿朗读。讲话结束时，全场又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吴老讲话只有半个小时，怎么讲稿有那么厚？有个小伙子凑到讲台近处观望，吴老立即明白其意思，把一张讲稿给大家看，原来老先生是用毛笔写的大字，估计一张只有几十个字，台下又是一片掌声。以后每逢开学或重大节日，都由吴老代表学校讲话。据说，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以党委书记胡某为首的一些党委委员，主张将右派分子全部开除学籍，发配到边远地区进行劳动改造。最后让吴玉章校长表态，吴老说，他们还年轻嘛，建议全部保留学籍，原来在哪个系，哪个专业，不要变动。只要考试成绩合格，到时候照样分配工作！其后事实证明，人民大学是执行了吴老的提议，吴老因而受到全体师生的尊敬。后来全国人文社科设立吴玉章奖，这是吴老应得的荣誉。

其三，1956年秋，刚入人民大学不久，我十分兴奋，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篇散文《杂感三则》：一则感叹有美丽的校园，清洁的操场；二则赞美教师的德才兼备，教书育人；三则感叹图书馆，藏书丰富。《杂感三则》发表在1956年12月《人民大学周报》上，署名雷峰。

其四，1958年10月，全班去北京市顺义县农村劳动锻炼，班上的一些“左派”歧视我等“中右”，让我们干重活、脏活，并让我在两周内写出一篇有关农业的文章。结果，我一周内就写出来了。文章题目是《农业要实现机械化》，发表在1958年11—12月份《北京农民报》上。

其五，1959年秋，我与几个班的同学到西郊参加深翻地劳动。我班同学才树祥与一班同学苏叔阳（后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在休息时，两人经常表演快板和相声，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我班住在香山东北坡下，隔一条公路便是著名的碧云寺。我们这些年轻人抽空便在公路上锻炼、跑步。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几年后才知道，有文物专家考证，我们住的那套房子，就是当年曹雪芹

写作《红楼梦》的住处，我们全班同学都感到十分荣幸。

其六，我亲自参加过修建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伟大工程。那年我22岁，正当锦绣年华之际，在明朝十三陵附近，身为“黄继光突击队”成员之一。每顿饭能吃四个小馒头、一碗菜，上大坝时肩挑四筐土，能一口气挑上去！

大学毕业之际，系领导给每个毕业生发一份志愿表让填写。据我所知，毕业生普遍填写“三到”：“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本想回大连市或瓦房店镇、沈阳市教书，但不敢，害怕再给我扣上一顶“个人主义”的帽子，于是也填“三到”。不久同学们之间互相传递信息，谁谁留校了，某某分配到北京市某机关了。于是我也急了，害怕不给我分配工作，背着“包袱”去找胡华老师，打听我的工作有无消息。胡老师笑着说：“你别背‘包袱’，我们已经商量过，在大学开学前一星期，你到陕西省教育厅人事局报到，看他们给你分配到哪所大学。”我听到很高兴。西安是著名古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块宝地，在西安让我教中学都可以。同学分别时是既未会餐，也未合影。我独自一人，卷起行李，提了个书包就离开人大，回东北老家去了。

回到家里，父母见我大学毕业回来，十分高兴，都60多岁的老人，还亲自给我扛行李。我见父母身体还健康，也十分高兴。这时，我大伯早已病逝，在大连西岗区居住的大姐也已去世，二姐全家还住在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三姐与三姐夫杨连仲住在大连市郊区。我的老家只有父母两人，我从心里深感两位老人太孤单了！又遭遇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的头两年，在人民公社里面两位老人能挣多少工分？父亲一年养3头猪，母亲一年喂上百只鸡，给别人缝10多件衣服（手工缝制）能赚多少钱？父母见我表情苦闷，都笑着说，你到西安好好工作，都24岁了，该找媳妇了，不要管我们！于是我在家里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又到大连市我二姐家住了几夭，就奔向西安去了。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古都西安，但是当时尚无兴趣观赏西安的风景和古迹，心想先找到工作岗位要紧。1960年8月，在规定的到陕西省教育厅报到前三夭，我找到教育厅人事局。一进门便见到一位老同志，约50岁，坐在那里认真看报。见我进来便问：“小伙子，有何事？请坐。”我回答：“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系领导让我来此报到，不知道到哪所学校工作？”老先生又把我细看一下，说：“你怎么有点愁眉苦脸的。我看了你的档案，你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学习成绩很棒！”他还伸个大拇指向上给我看，又说：“我们研究了一

下，有两所大学由你选择，一所是陕西师范大学，另一所是西北政法学院。”一下子把我乐懵了！还让我选择？停了两三分钟，没有回答出来。老先生笑着说：“看来你没有思想准备，考虑一下，三天后再来吧。”我走出教育厅以后，没到三天我就又来了，害怕来晚了别人先去陕师大了。刚跨进省人事局房门，那位老先生说：“小伙子你来晚了一天，昨天你系的同学何铭三来了，她一下子就选择了陕西师大。那你就到西北政法学院去吧！”我二话没说，就直奔西安南郊的西北政法学院去了。

当时西北政法学院共有哲学系、党史系、法律系、新闻系、政经系五个系，800多名学生。人事处把我分到中共党史系，系主任曹树铮，副主任张君藻，给我的印象都挺好。他们派人给我找了一间空房，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子，就此我正式成为一名教师。西北政法学院开学后不久，党史系教师开会研究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和授课时间。总书记讲话中有一句“非党教师不能讲授党史课”，我一听颇受震动：那为什么把我安排到党史系。但未过一周，系主任曹树铮传来好消息：五个系800多名学生要上一门共同课：中国通史。谁愿上这门课，就来我这里报名，同时成立中国通史教研组。我与老教师何子沈立即上前报名，何老师比我大20多岁，担任教研组长。第二天上午，我们两人在一起，并有系领导参加，研究如何分工并讲授中国通史课。经研究后决定：中国通史课共120课时。其中，中国古代史40课时，近代史80课时，这符合“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古代史由何子沈先生讲授，由我辅导；近代史由我讲授。由何老师主讲的中国古代史，因只有40课时，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专题。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到明末李自成起义，共10个专题。我辅导时，还组织了一次关于农民起义所建政权的性质的学术讨论。在三年困难时期，政治上相对比较宽松，中央提出“三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我指导下的学术讨论会是比较成功的。何老师讲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专题后，我开始讲中国近代史，在此前我用一个多月时间撰写讲稿。专题式的，章节也是大小专题。这是我长期坚持专题式讲课的开始，讲稿写完后，便开始背诵。我把当时政法学院周围的庄稼当成学生，一直讲到背诵而不像背诵，全是演讲。核心内容是弘扬近代80年来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记得我在讲中国近代史“序言”时，教室就是直至现在还保留的小礼堂，能坐上千人，当时政法学院五个系，800多名学生全来听课。当我迈上讲台时，有一个男生高呼：起立敬礼！800多名学生一齐站起来；又喊一声：坐下！

唰的一声坐下！我感到震撼，感到高兴。于是，将手拿的讲稿放到讲台上，开始演讲。每当讲到56个民族组成的伟大中华民族，要弘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我没想到，台下掌声雷动，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使我感动！第一次讲课的成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于是我更加勤奋地备课，直到1962年上半年把中国近代史课讲完。下半年学校又发生变化，校长宣布，从下学期开始，政经、党史、新闻、哲学系暂停招生，只招法律系，但原有系的学生念完四年照常毕业。这下子不再讲中国近代史了，要讲法制史，不过谁来承担这个重任呢？正在这时，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林剑鸣、张永禄、屈玉祥、高景明等来到政法学院，组成法制史教研组，组长方克勤（女），由法学概论教研室主任马朱炎领导。新学期刚上课不久，中国法制史课领导让我打头阵。正在我兴高采烈之际，又传来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会不会因我有政治“包袱”，把我刷掉呢？不，不会吧，因为已让我登上讲台。据说校党委开会研究精简机构，提到我时，副校长王润和曹树铮等人都说赵文润讲课讲得好，不能下放。我听说后，高兴极了，更加认真备课，讲好课。这时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已过，我忽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扬鞭再催马》：

敲起时代的战鼓，
吹响前进的喇叭。
三面红旗呼啦啦飘，
祖国跨上千里马。
祖国，飞奔向前，
英姿焕发，
您身上闪着金光，
脚下踩着银花。
如今是又一个新的起点，
我送给您第十三支迎春花，
祝您迎着共产主义的朝阳，
一路凯歌，扬鞭再催马……

这篇短诗在1962年9月30日《西安晚报》上发表后，不知是哪位书法家用毛笔字，把全篇诗文写在西安市骡马市粉白的东墙壁上，当时围观的人很多。

1964年8月，我与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友赵道兰结婚了。她时年25岁，比我小3岁，经学校批准，我们到派出所领了结婚证，便在西安南站坐上汽车，从西